



《吕氏春秋》文学研究

管宗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吕氏春秋》文学研究

管宗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氏春秋》文学研究 / 管宗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7158 - 5

I. ①吕… II. ①管… III. ①杂家②《吕氏春秋》—文学研究 IV. ①B229. 25②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337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特约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李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辽宁省社科联省校合作项目
“先秦子书结构艺术对比研究”资助

序

李炳海

管宗昌博士研究《吕氏春秋》的学术专著即将出版。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如果从最初选题、设计算起，已经历时七年。这部著作的撰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管宗昌博士在把《吕氏春秋》确定为论文选题之前，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列子》，并且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对先秦诸子进行探究，是本书作者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列子》《吕氏春秋》的研究具有连贯性。照理说来，他可以顺势而下，把《列子》研究所积累的经验、所采用的方法延续下来，投入《吕氏春秋》的文学研究。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他的《吕氏春秋》研究从开始设计提纲，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清人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写道：“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刘氏之论揭示出先秦诸子著作在样态上的多样性，即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特征，而不相雷同。即以《列子》和《吕氏春秋》这两部著作为例，它们的文本形态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列子》全书八篇，各篇的文字量均比较大，可称为长篇巨制。如果按照近代以来的文学观念对它进行研究，从形象、情节、环境、典型等方面加以审视，固然会留下许多遗憾，出现一系列未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还有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付诸实

践。《吕氏春秋》则不同，全书共一百多篇，按照东汉高诱所作的统计，总共十七万三千零五十四字，每篇字数很少。如果以单篇作品作为考察单元，从中寻找形象、情节、环境、典型等方面所谓的文学因素，很难揭示出作品的价值。这些因素即使存在于某些作品之中，那也只不过是散金碎玉、不成规模。而近代以来的《吕氏春秋》文学研究，基本是在西方文学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从中能够找出的文学因素，局限于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这个单一向度，无法再进行深入的开掘。面对这种研究状况，管宗昌博士把《吕氏春秋》作为论文选题，首先设计的是如何调整视角、改变思维方式，从这部子学著作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理路进行全面考量。可以这样说，管宗昌博士在《吕氏春秋》研究的开始阶段，就成功地实现了学术的转型，即由西方文学理论框架转向中国古代传统的文章学。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而言，这是一次靓丽的转身。

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方法的获得，一方面要借鉴于前人，另一方面，要通过具体操作实践进行摸索和掌握，而后者尤为重要。如果能够确立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无疑会形成个人的学术风格，习惯于采用自己熟悉的方法。但是，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原来采用的方法就未必完全能够适应。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没有普遍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研究方法。因此，能否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而相应地调整所采用的方法，是研究工作成败的关键。管宗昌博士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实现了研究理路的调整，这是他的这部学术著作能够有所创获的重要原因。

二

《吕氏春秋》研究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本位，转到古代文章学的视域，管宗昌博士这部著作，确实能够紧扣古代文章学的要害和枢纽设计纲目，实现学术上的重要突破。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对《吕氏春秋》一书结构所作的研究。结构是文章的骨架，古代文章学对此高度重视。《文心雕龙》的《章句》《镕裁》《附会》，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论述文章的结构调遣，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之一。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往往在于它的起承转合，也就是文章的结构。近代以来，由于借鉴西方文学理论过多，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相对薄弱，对文章结构所作的探讨

也往往被忽视。直到 20 世纪末，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先秦诸子的文章结构开始陆续进入学人专门研究的选题系列，并且推出一些论著。就此而论，管宗昌博士这部著作把文章结构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论述，并放置在第一章，是站在当代学术前沿审时度势，起点较高、顺应学术发展的潮流。

《吕氏春秋》全书的结构颇为特殊，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板块。对此，以往的学术论著、文学史教材已经有所关注。如赵明教授等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写道：

《吕氏春秋》在结构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的“十二纪”在全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依照“法天地”的基本思想来安排天子一年的活动，同时表现了自然社会和谐的思想。

所作的概括是准确的，后面对这个板块内部贯穿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线索，所做的揭示亦颇为精到。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卷对《吕氏春秋》亦有类似描述：

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编者在兼收并蓄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章学观念已经超出了先秦诸子。

这段话也是从文章学角度论述《吕氏春秋》的结构，并且覆盖全书的内容。

以上这两部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初版的时间依次是 1998 年、1999 年，也就是说，在管宗昌博士把《吕氏春秋》作为论文选题之前，学术界对《吕氏春秋》的结构就已经有所论述，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可。在这种形势下，能否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超越，成为《吕氏春秋》结构研究必须经历的考验。综观管宗昌博士这部著作，在《吕氏春秋》结构研究方面确实较之以往有所突破。赵明教授等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对《吕氏春秋》结构所作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十二纪”，其他两个板块则很少涉及。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卷，虽然是针

对《吕氏春秋》全书立论，但是并没有深入到各个板块进行具体论述。管宗昌博士这部著作对《吕氏春秋》结构所作的探讨，在广度和深度上较之以往的研究成果均有所超越，这从该章的三个标题就可以得到验证：十二纪的结构、八览的内部结构、八览的总体结构。这三节涉及《吕氏春秋》两个板块，另一个板块“六论”没有涉及，在管宗昌博士看来，六论没有十分明显的结构体系性。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不过从总体上对《吕氏春秋》的结构进行观照，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已是难能可贵。这部著作的第二、三章，分别论述《吕氏春秋》的叙事和议论，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同样关注所涉及文章的结构，并且不乏精彩的分析和论断。把结构研究覆盖《吕氏春秋》全书，成为贯穿这部即将出版的学术专著的一条重要线索，这是撰写者研究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

三

这部学术专著列有附录：《吕氏春秋》篇幅字数统计与评述。附录列在全书正文之后，这是行文体例。其实管宗昌博士的《吕氏春秋》研究，最先投入的操作就是对全书各篇字数所作的统计。后来，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与会各位老师的一致肯定。也就是说，各篇文章字数的统计，成为他《吕氏春秋》研究的开端和基础，这就涉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关系。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重视的是定性，而不是定量。虽然偶尔也可以见到定量统计，但在整个研究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没有形成传统。定量统计大量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始于西方，而在近代历史学中变得成熟，出现了学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少学人自觉地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成果。《吕氏春秋》研究采用量化统计的方式发端，可谓切中肯綮。统计成果表明，全书百余篇文章，各篇的字数大体均衡，只有少数篇目例外，这种统计结果与原来的猜测大体符合。在当今的电脑网络时代，对于像《吕氏春秋》这类常见著作进行文章字数统计，并非难事，而是很容易操作，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这种自觉意识，以及对量化统计的结果如何处理。管宗昌博士具有量化统计的自觉性，并且对统计结果的处理也颇为得当。《吕氏春秋》出自众人之手，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至于参加撰写的人员如何进行操作，书中没有明确的交待。通过统计可知，各篇

文章的撰写，不但有思想内容方面的规定，而且有字数的限制。全书百余篇文章，各篇字数大体一致，采用的基本是整齐划一的标准。这样一来，就不能简单地把《吕氏春秋》视为单篇论文的结集，而要把它看作是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的文化系统工程的产物。当下盛行的集体编书的操作方式，可以从《吕氏春秋》那里找到源头，它是先秦时期集体编书体制已经成熟的标志。既然如此，对于《吕氏春秋》中的文章，就不能像对待其他先秦诸子著作那样处理，而必须区别对待。《吕氏春秋》的文章是按照固定程序批量生产，是手工作坊的加工方式，难免沾染工匠气。有鉴于此，对它所作的研究就很难用文学的形象、情节、情感、境界等方面加以框定。否则，不是隔靴搔痒，就是削足适履，脱离文章的实际。管宗昌博士的这部著作，一方面对量化统计的运用比较自觉，另一方面，对量化结果的处理也颇为得当。这部著作除了对《吕氏春秋》各篇文章的字数做了统计，在有些章节间同样采用量化的方式展开论述，现实定量分析，然后进行定性，得出的结论颇有说服力。对全书各篇文章字数所作的统计，也发现个别例外情况。例如，《有始览》和《本味》篇的字数明显多于全书各篇的平均数，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这部著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由此可见，量化统计不但揭示出《吕氏春秋》全书的结构特点，而且发现了《有始览》《本味》等篇在全书中的特殊地位。

从《本味》篇的实际情况考察，它之所以在全书篇幅最长，可能与吕不韦的人生和政治寄托有直接关系。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伊尹与商汤君臣遇合的故事，寄托的是圣主贤臣相遇的人生理想。商汤去世之后，伊尹又辅佐太甲，被称为父师。而吕不韦当时居相国之位，号称仲父，这与伊尹在商朝的地位极其相似。《本味》篇以至味说成汤，反复强调所谓的至味，“为天子然后可具”，“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这是对商汤以天子之位相引诱，鼓励他成就帝王大业。当时秦国已经灭掉东周王朝，秦王对天子之位的企盼已经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并且稳操胜券。《本味》篇既是吕不韦人生理想的寄托，又是他政治理想的表达，是对秦王一统天下的期待。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所以，它的篇幅最长，在全书中处于鹤立鸡群的地位。

由对《吕氏春秋》各篇文章字数的统计，引出《本味》篇所表达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其实，这种量化统计也为《吕氏春秋》在思想流派方面的归属提供了可靠的参照。《吕氏春秋》究竟属于杂家，还是应该

列入新道家，这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话题，至今无法达成共识。综观以往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探讨、争论，基本是以《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为依托，见不到从形式、结构方面寻找证据的做法。对《吕氏春秋》各篇文章字数所作的统计表明，这部子书从总体设计到具体篇目的撰写，都有方圆规矩可循，甚至在字数上都有基本一致的标准，其中渗透的是对规则、秩序、度数的崇尚，可以说是法度森严。这正是先秦法家的行文特色，《韩非子》多数篇目就是如此，两部成书时段大体相同的子书，在这方面可以相互印证。量化统计得出的结果是抽象的数字，但是，对统计结果的考察处理，却可以发现与文章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议题，由此看来，定量研究确实不容忽视，有它特殊的功用。

四

《吕氏春秋》全书“法天地”的结构体系，业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对于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板块所用的数字，学界所作的探讨仍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十二纪是以每年十二个月为序依次展开，划分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古代先民对季节及月份的划分是以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行为根据，十二纪相对应的是天。先秦时期所说的八风、八音等，相对应的是大地的八方，《周易·说卦》就把八卦与地之八方相配，八览相对应的是地。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推导，六论相对应的应该就是人间之事。《周易·说卦》把天地人成为三才，认为《周易》每卦六爻四取法天地人三才又乘以二的产物。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三个板块也是取法天地人三才，与《说卦》所表达的理念是一致的。

对《吕氏春秋》三个板块所涉数字象征意义作上述认定，似乎可以成立，但是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十二与天相对，八与地相对，可以从当时的天文历法、人们的空间观念中找到依据。可是，把六与人间事象建立起对应关系，它的依据何在呢？这要从《吕氏春秋》中寻找内证。《有始览·应同》篇有如下一段文字：

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色则水。

陈奇猷先生《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一文，对《有始览·应同》篇上述文字所作的分析如下：

周以火德王，秦以水德胜，周道灭亡，秦以水德代之，东周甫亡，继之即为秦火德的统治，所以纪年要从水德代火之年即秦代周的癸丑年算起。

陈先生给出的结论是可信的。《吕氏春秋》编写期间，秦已灭周。秦自认为属水德，而在五行说体系中，与火相对应的数字是六，《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冬季三个月，均是把六与水神玄冥相配。《吕氏春秋》的六论，六所对应的人间之事，是以秦为本位，以秦代表天地人三极中属于人的一极。由此看来，断定《吕氏春秋》全书结构是“法天地”固然不错，但是，用天地人三极鼎力加以概括，似乎更加确切。这种结构模式对《淮南子》《史记》均有影响。

五

《吕氏春秋》是先秦诸子著作的殿军，其中所用的许多文献资料，在此前的一些诸子著作中也可以见到。管宗昌博士的这部学术专著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且采用依类相次、按时段进行比对的处理方式，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文献的掌握运用方面扎实的基本功。

先秦诸子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同类文献，追究它的最初生成存在很大难度，多数无法加以确定。由此而来，同类文献的比对，就很难按照时间顺序确定彼此之间的传承、借鉴。最近几年，青年学者徐建委博士通过对《说苑》等先秦两汉文献的深入研究，对这个时段反复出现的文献提出“公共资源”说，即有些文献是当时学人共同拥有的资源，大家都可以利用。这种说法颇有道理，符合那个时段的实际情况。按照这种理路去审视先秦诸子作品中反复运用的文献资料，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可以避免许多繁琐的考证。把反复出现的文献资料作为既定的公共资源予以认可，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学派、著作对它采用的处理方式，很容易发现彼此之间的同和异。当然，这种横向对比也不妨引入时间维度，从中揭示同

一文献在不同时段被运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从实际情况考察，对于具有公共资源性质的文献进行追本溯源，多数案例很难得到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推断某类文献运用的历史沿袭，不如把它作为公共资源加以处理。这种操作方式对先秦两阶段的文献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六

管宗昌博士在硕士期间师从许志刚教授，在治学方法、文献处理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博士生期间，我有幸成为他的导师。围绕《吕氏春秋》研究，我们有过许多沟通和切磋。限于本人当时的学识，还有些问题在当时未能得到解决。在他毕业数年之后，对这些疑难问题重新加以思索，似乎还有话可说，因此，拉拉杂杂写下以上随感，作为对以往指导欠缺的弥补。姑妄言之，亦请学界同仁姑妄听之。

管宗昌博士执着于学术，并且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先是《列子》，然后是《吕氏春秋》，目前又转向《淮南子》，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格局。当今时代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已经很多，但是，毕生在学术上能够真正超越自己博士论文水平的人并不是很多。期待管宗昌博士能够实现人生的自我超越，推出更加精深的学术力作。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吕氏春秋》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1)
第二节 《吕氏春秋》文学研究的意义	(10)
第三节 《吕氏春秋》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12)
第一章 《吕氏春秋》的结构	(14)
第一节 《吕氏春秋》结构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14)
第二节 十二纪的结构	(23)
第三节 八览的内部结构	(53)
第四节 八览的总体结构	(80)
第二章 《吕氏春秋》的叙事	(101)
第一节 《吕氏春秋》对历史故事的采录与编排	(101)
第二节 《吕氏春秋》对长篇历史故事的处理	(109)
第三节 《吕氏春秋》对浓缩型历史典故的运用	(120)
第四节 《本味》篇的叙述特征及其文学意义	(129)
第三章 《吕氏春秋》的议论	(152)
第一节 《吕氏春秋》概念的宽泛性	(152)
第二节 《吕氏春秋》议论的辩证性及其君臣理念	(162)
第三节 《有始览》的议论及其文学意义	(177)
第四节 《任地》等三篇的议论及其文学意义	(196)
第四章 《吕氏春秋》与其他文献的关系	(216)
第一节 从“管仲病重进言”的故事看	(216)
第二节 《吕氏春秋》对《庄子·让王》篇的借用	(233)
第三节 《吕氏春秋》对《墨子·所染》篇的利用 和改造	(244)

第四节 《孝行览》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	(252)
结 语	(260)
附录 《吕氏春秋》篇幅字数统计与评述	(262)
主要参考文献	(266)
后 记	(272)

图表索引

表 1-1 《孝行览》的历史故事与题材类别	(54)
表 1-2 《孝行览》各篇之间的关系	(62)
表 1-3 《慎大览》的历史故事与题材类别	(64)
表 1-4 《慎大览》各篇之间的关系	(70)
表 1-5 《审应览》的历史故事与题材类别	(71)
表 1-6 《审应览》各篇的主旨与主要论点	(73)
表 1-7 《有始览》与相关篇目的互见关系	(82)
表 1-8 每览靠前篇目的故事题材与主题	(93)
表 1-9 八览之间的结构理念	(94)
表 2-1 《先识览》所收录的历史故事	(102)
表 2-2 《先识览》历史故事的年代	(106)
表 2-3 《孝行览》各篇的论点与历史故事	(130)
表 2-4 《本味》《礼记·内则》《尔雅》对相关物类的划分	(133)
表 2-5 《本味》食材与《山海经》的对比	(139)
表 3-1 “三秋纪”作品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157)
表 4-1 《吕氏春秋》相关篇目与《庄子·让王》篇的关系	(235)
表 4-2 《庄子·让王》篇的故事与题材类型	(243)
表 4-3 《墨子·所染》与《吕氏春秋·当染》的对比一	(244)
表 4-4 《墨子·所染》与《吕氏春秋·当染》的对比二	(251)

绪 论

第一节 《吕氏春秋》研究的历史及现状

《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期，在汉代曾一度受到青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将之与《周易》《春秋》《离骚》《诗经》等一同看作圣贤发愤之作；《史记》专列《吕不韦列传》对“吕览”也有专言记述。至东汉高诱为之训解，作《吕氏春秋注》17余万言，其《序》极称《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但是汉代以降，《吕氏春秋》却屡遭贬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不外两点：^①一是吕不韦人品低下，因人废书；二是《吕氏春秋》隶属杂家，由于过于驳杂，没有较为确定和统一的理论主张，因而不受重视。

直到清代才兴起了以朴学为主要特色的《吕氏春秋》研究，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是其代表，另外如梁玉绳《吕子校补》和《吕子校续补》、陈昌齐《吕氏春秋正误》、吕调阳《吕氏春秋释地》、孙锵鸣《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吴汝纶《吕氏春秋点勘》等，也是《吕氏春秋》校勘的重要著作。总体看来，20世纪以前的《吕氏春秋》研究其主要形式是校勘和注疏。而对其义理、结构等的开掘和解读只是偶有出现，并未形成规模。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徐时栋对其结构的解读、孙星衍对著书年代的推断等，或有见解但不成系统。

对《吕氏春秋》研究的全面展开是从20世纪开始的。

（一）20世纪前半叶（1950年以前）

20世纪前半叶是《吕氏春秋》研究的朴学承继阶段和全面研究的起

^① 丁原明：《论〈吕氏春秋〉及其历史作用》，《文史哲》1982年第4期。

步阶段。

由于20世纪以前《吕氏春秋》研究主要是校勘和注疏，朴学特色浓厚，20世纪前三十年的研究并没有马上褪尽这一特色，属于承继阶段。如刘咸炘《吕氏春秋发微》、孙蜀丞《〈吕氏春秋〉举正》、宋慈寰《〈吕氏春秋〉补正》、刘文典《〈吕氏春秋〉斟补》等仍然侧重于注疏和校勘。

值得注意的是，这前三十年中开掘和解读之作渐多。如：刘咸炘《吕氏春秋发微》、梁启超《尸子广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合释》、刘复《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节解》等，这些著作多专注《吕氏春秋》的部分而非全书，在校勘的基础上多有生发。涉及的问题包括：《吕》与诸子关系及思想归属、《吕》中乐器的构造等。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其后对《吕》思想的研究和对其文本价值的开掘。

20世纪前半叶的后二十年呈现出全面研究的起步景象。表现在：

第一，传统的注疏、校勘方式仍然存在。

这20年中仍带有前三十年朴学承继的特征，有三部重要的校释作品值得注意：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1935年），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四人合著《〈吕氏春秋〉汇校》和王利器《吕氏春秋比义》。其中王利器《吕氏春秋比义》未得传世，但是后来影响较大的《吕氏春秋注疏》是作者在此作基础上整理而成，于1966年完稿。许维通《吕氏春秋集释》影响较大，是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之后注疏校勘的代表作品，显示了作者扎实的考据功底，为之后的校释、注疏以及全面研究的展开提供了良好条件。

另外，如谭戒甫《吕子辑校补正》也是这一时段的校勘作品。

第二，对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基本问题的考证。

这一时段考证的特色仍然十分浓厚。涉及吕不韦身世遭遇，特别是《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三部分成书与排列次序等基本问题的研究逐渐增多。如：钱穆《吕不韦著书考》，王利器《“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说》《“吕不韦”释名》，缪钺《〈吕氏春秋〉撰著考》，李泰棻《吕不韦及〈吕氏春秋〉考》等，分别探讨了吕不韦的身世遭遇、《吕氏春秋》的编撰等基本问题。

应该说，这些研究内容多属于文献考据的范畴，而传统的《吕氏春秋》研究中也时有出现，如清代孙星衍对其成书年代的推断等。这些研